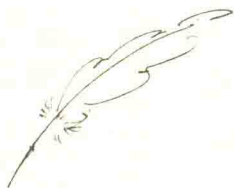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理查德·维克利 Richard L. Velkley ● 著

论源初遗忘

——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与哲学的前提

Heidegger, Strauss, and the Premises of Philosophy :
On Original Forgetting

谢亚洲 杨永强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论源初遗忘

—— 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与哲学的前提

Heidegger, Strauss, and the Premises of Philosophy :
On Original Forgetting

[美]理查德·维克利 Richard L. Velkley | 著

谢亚洲 杨永强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源初遗忘: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与哲学的前提 / (美)理查德·维克利(Richard L. Velkley)著; 谢亚洲, 杨永强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6. 10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Heidegger, Strauss, and the Premises of Philosophy: On Original Forgetting

ISBN 978-7-5080-8910-2

I. ①论… II. ①理… ②谢… ③杨…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1976) — 哲学思想 — 研究 ② 施特劳斯, L. (1899-1973)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16.54 ②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9192 号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2011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0858 号

论源初遗忘

作者 [美]理查德·维克利

译者 谢亚洲 杨永强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施特劳斯集”出版说明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Hessen地区Kirchhain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的分析”,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三十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年移居美国,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十一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二十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主流学界的治学路向,身前却从未成为学界声名显赫的名人。去世之后,施特劳斯才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施特劳斯身后才逐渐扩大的学术影响竟然一再引发学界激烈的政治争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得,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主义师主;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

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施特劳斯的哲学名流,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视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关心的问题更具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施特劳斯不仅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回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

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施特劳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劳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施特劳斯生前未刊文稿和讲稿;已由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起源》、《思索马基雅维利》、《城邦与人》、《古今自由主义》)除外),并选译有学术水准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相信,按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培育自己,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主义”的教诲师,倒是难免走上艰难地思考中国文明传统的思想历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8 年

中译本序

很高兴我的关于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的这一研究能被介绍给中国读者。此时此刻,在中国已有很多学者为这本书做了准备,因为在中国,这两位哲人都已受到严肃对待。同样,恕我冒昧,我认为,与美国情况一样,在中国无法将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同研究施特劳斯的学者划分为不同阵营。在美国,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这两位思想家就已经拥有追随者,只是双方并没有什么联系。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这主要由于在上世纪 90 年代,欧洲和加拿大学者开始研究施特劳斯的生活和智识发展。这项研究强调以下事情:施特劳斯早年(20 世纪 20 年代)曾师从德国主要的先师和思想家(卡西尔、胡塞尔、海德格尔);施特劳斯参与了德国一战后事关欧洲启蒙运动之地位的智识骚动(the intellectual ferment)。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其他弟子通信的出版,尤为清楚地表明:海德格尔的教导与著述,对施特劳斯的影响既深刻又持久。

我不想在此重复我书中的观点。我只想说,对施特劳斯 20 世纪 20 年代的思想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起点是尼采批判西方理性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这种冲击因海德格尔——通过他所谓的对传统的解构(Destruktion)——揭示了一个已遭遗忘的问题域而增强,因为该问题域已由理性主义传统所覆盖。在施特劳斯看来,海德格尔是在表明:西方哲学面临着一个危机时刻,甚至面临着一个可能倒塌的时刻,但是,以哲学追问来恢复理性主义传统的希腊开端,就能打开充满新生的前景。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阅读经典文本的原始方式印象颇深,为了制造一个新的开端,施特劳斯同样利用

2 论源初遗忘

这些资源,但同海德格尔不同的是,施特劳斯专注于关键人物苏格拉底,同时专注于苏格拉底所发现的政治哲学。本书旨在讨论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两条不同路径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从恢复古希腊的各种洞见开始,并以此来寻找一条导向哲学之未知命运的道路。

维克利

2015年10月10日,新奥尔良

致 谢

我想对奥林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John M. Olin Center for Inquiry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mocracy)、勒弗拉克论坛(LeFrak Forum)以及“科学、理性和现代民主学术研讨会”(Symposium on Science, Reason, and Modern Democracy)表达感激之情,同时对塔克夫(Nathan Tarcov)和泽曼(Richard Zinman)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会议组织者)邀我参加2001年4月至5月在芝加哥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举办的“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表的一篇演讲,成为本书的第七章。同样,我还要向“海德格尔研究小组”(Heidegger - Forschungsgruppe)的登克尔(Alfred Denker)和察博罗夫斯基(Holger Zaborowski)表示感激,是他们让我有机会能在2004年、2006年以及2008年该研究小组在德国梅斯基尔希举办的会议上发言,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便来自这些发言,同时感激已故的美国天主教大学哲学系主任普利策尔(Kurt Pritzl, O. P.)博士,在他的邀请下,我为2007年秋季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系列讲座递交了一篇论文,而本书的第一章正源于这篇论文。我还要感谢众多朋友和同事,他们和我就本书的许多部分进行过讨论:阿什(Avner Ash)、鲍曼(Fred Baumann)、伯纳德特(Diego Benardete)、伯曼(Robert Berman)、伯格(Ronna Burger)、戴维斯(Michael Davis)、古丁(Patrick Goodin)、古热维奇(Victor Gourevitch)、哈斯因(Richard Hassing)、里拉(Mark Lilla)、拉纳辛格(Nalin Ranasinghe)、希尔(Susan Shell)、希特(Martin Sitte)、塔克夫、察博罗夫斯基、以及扎科特(Catherine Zuckert)。对沃尔特斯

(Brian Walters)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布兰特(David Brent)与艾维(Laura Avey),我也心怀感激,他们在本书手稿和技术等方面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在本书编辑的最后阶段,能与苏珊·塔科夫(Susan Tarcov)一起工作也实属幸事。

本书的部分章节之前已被发表:第四章发表在拉纳辛格所编撰的《言辞与爱欲:罗森纪念文集》(*Logos and Eros: Essays Honoring Stanley Rosen*, South Bend, IN: St. Augustine's Press, 2006)中;第六章有一个德文版的缩减本,《海德格尔、施特劳斯和国家社会主义》(Heidegger, Strauss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载于登克尔和察博罗夫斯基所编撰的《海德格尔和国家社会主义——解释》(*Heidegg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 Interpretationen*, 见 *Heidegger - Jahrbuch*, vol. 5, Stuttgart: Alber Verlag, 2009);第七章发表在《政治学评论》(*Review of Politics* 70, no. 2, 2008 年春),页 245 - 259。

目 录

中译本序	(1)
致谢	(1)
导言	(1)
第一部分 在现代性的巅峰重述古典	
第一章 原初真理、误入歧途的传统与危机	(42)
第二章 “现代哲学的不彻底性”	(63)
第三章 论洞穴与历史	(92)
第二部分 自由与政治的紧迫	
第四章 源于善的自由	(118)
第五章 海德格尔论尼采与更高的自由	(137)
第六章 政治哲学的空间	(155)
第三部分 建构现代性	
第七章 论理性主义之根——回应海德格尔	(170)
第八章 现代性是一种非自然的建构吗?	(188)
第九章 施特劳斯论个体性与诗	(199)
结语 居住与放逐	(217)
著作缩写表	(230)

导 言

为了充分弄清存在问题,我们必须使一种存在者——追问者——在他自己的存在之内通透可见。对存在问题的发问正是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因此发问本身是由问之所问所规定,即由存在所规定。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现在,发问要优先于回答。上帝不会发问,但却能回答。发问比回答更能体现出人类理智的特性。没有无问题的回答,但确实有无答案的问题。

——施特劳斯《当今宗教状况》

[1]“这个时代的危机给了我们以偶然的的机会,使我们能够用一种非传统或者新的方式去理解那些迄今为止只能用传统的或衍生性的方式去理解的事情。”(CM,9)^①20世纪是个充满危机的时

① “危机”与“批判”术语并不仅仅意指哲学史上的契机(moments)或可能立场,而且意指哲思本身的条件。哲学思想不能“如此信心十足地朝前看,就好像它所走过的道路是如此笔直地通向目标似的,同时好像公认的诸前提如此值得信赖,以至于没有必要经常回顾它们,也没有必要留意我们是否可能在推理的过程中无法发现一些缺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735/B763)在

代,也是个质疑传统的时代,正是 20 世纪见证了以下事件:一大批重要的思想家力图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根源、意义和命运形成新的洞见。在参与这场质询运动的所有思想家当中,马丁·海德格尔和列奥·施特劳斯是形成了对哲学传统——该传统在根本性追问中源起的同时也遭受着遗忘——最具洞察力分析的两位。^①毋庸置疑,对这些思想家们的这种紧密关联将会引起众多读者的不满。海德格尔的追随者不可能把施特劳斯当作同类具有敏锐洞察力和根本性的思想家来看待。即使他们认为施特劳斯和海德格尔存在某些关联,那也只是将施特劳斯视为后来“彻底的历史主义”的那个批评者,随即视之为以一种敌对的声音,而不是以友善的读者口吻去公开挑战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传统的审问。而施特劳斯的追随者通常认为海德格尔对施特劳斯早期有激发作用,由于海德格尔的哲学表明了传统向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终极衰落——这种衰落的政治显示正是海德格尔参加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因此,为了一种更为有益的哲学努力,施特劳斯很快便把这些东西甩在身后。[2]相应地,成熟时期的施特劳斯思想注意到,海德格尔仅仅是为

不断更新的关于开端的探求中,其圆心被证明无处不在,而其周长却并不存在。思想前进运动中的休止与危机,是哲学思想中洞识以及“进步”的显著标志。在辩证法之剧中,主唱段(parabasis)必然是首要情节(action)和主题。将哲学解释为“批判性科学”的解释,就此而言,其任务在于用这样一种方式区分(krinein)差异,即它“总是将其自身置于最极端的批判之中”,见 GA 22, 页 7-11。

① 人们不应该忽视此二人曾受惠于胡塞尔(Edmund Husserl),胡塞尔对“危机”的主题化(thematizing)以及分析此危机的现象学方法正好都体现了这一点。同时,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比胡塞尔更为集中地关注以希腊哲人的彻底追问方式来揭示传统的起源,并且关注那个由历史遮蔽了其起源的传统,尽管胡塞尔在其晚期的《欧洲科学与先验现象学的危机》中开始了与此相关的一种追问。参 Hwa Yol Jung,《科学主义的两位批判者:施特劳斯与胡塞尔》(Two Critic of Scientism; Leo Strauss and Edmund Husserl, 载于 *Independent Journal of Philosophy* 2, 1978, 页 81-88), 以及拙作《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见 *HPP*)。

了一些批判性和警戒性目的,而施特劳斯自己所关心的是复兴传统的开端,这种关心同海德格尔对传统的解构(Destruktion)努力只有表面的相似之处。与这些观点相反,我们要明确的是:施特劳斯和海德格尔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深思有着一种可比的根本性。施特劳斯毕生都与海德格尔——当代唯一的思想家——相关,他的思想总是在与海德格尔的本质对话中得以展开。

在最后出版的其中一部著作中,施特劳斯考察了政治哲学在近世三位伟大哲人思想中的位置,这三位哲人分别是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①他们帮助施特劳斯勾画了其思想方向。该论著包含这样的论断:“在我看来,海德格尔本人就持这样的意见,即他的批评者和他的追随者都没有完全理解他。我相信他是对的,因为对所有杰出的思想家而言,或多或少,不也都是如此吗?”(SPPP, 30)^②个人标注(“我相信他是对的”)的插入强化了这种质疑,即施特劳斯把“杰出的思想家”的一般性论断不但运用到海德格尔身上,同时也运用到他自己身上。他讲“源于经验”。如果这确定是施特劳斯罕见的、自我指涉的旁白之一,那全文就会变得引人注目,并暗示这样一个问题:施特劳斯是否意指对海德格尔理解的欠缺也就是对他自己理解的不充分?这不是一个众多施特劳斯的读者所追问的问题。尽管施特劳斯从他早年的私下写信,到晚年公开的演讲和所有著作中都论及海德格尔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伟大的思想家是海德格尔”,但只是到

① 《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政治哲学》(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见 SPPP, 页 29 - 37;首次发表在 *Interpretation* 2, no. 1 (1971)。

② 我不关心海德格尔是否做过这样一种表述,或者即便他做过,我也不在乎他以其所意指的东西。这里,我所关心的是施特劳斯的表述,以及就他自身与海德格尔的关系而言,他的表述所显示的东西。实际上,就他对海德格尔观点的看法而言,施特劳斯的权威性也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权威性显然也无法追溯到海德格尔直接所说的东西(“据我所知……”)。

最近,这两个人才以一种理论上实质性的方式关联到了一起。^①施特劳斯拉斯最令人熟知的著作《自然权利与历史》现在很容易被认为是一部针对海德格尔的著作,但在1953年出版时,海德格尔在英语世界仍默默无闻。^②而当海德格尔如星星般闪耀夜空之时,海德格尔的研究者与施特劳斯拉斯的学习者却各自独立成派。^③尽管如此,施特劳斯拉斯还是曾用他那表面上不经意的旁白充分表明:直到他的读者明

① 参1956年的演讲“海德格尔式存在主义导论”,见RCPR,页29。关于该演讲,一个更为可信的即以施特劳斯拉斯的原始标题“存在主义”为标题的版本刊登在*Interpretation* 22, no. 3 (1995), 页303-320。在同一个演讲中,施特劳斯拉斯说:“在海德格尔崭露头角之前,当时最杰出的德国哲人——我得说,唯一的德国哲人——是胡塞尔”,见RCPR,页28。这消除了关于施特劳斯拉斯是否将海德格尔视为哲人的问题。有关施特劳斯拉斯和海德格尔的文献讨论,可参看下列这些相关文章和论段:L. Batnitzky,《施特劳斯拉斯与列维纳斯:哲学与启示政治》(*Leo Strauss and Emmanuel Levinas: Philosophy and the Political of Reve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 Fleischacker 主编《海德格尔的犹太信徒》(*Heidegger's Jewish Follower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Kiermanegg, H. Mewes, E. Glaser - Schmidt,《阿伦特与施特劳斯拉斯》(*Hannah Arendt and Leo Strau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 B. Smith,《阅读施特劳斯拉斯:政治学、哲学、犹太教》(*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C. Zuckert,《后现代的柏拉图们》(*Post - modern Plato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C. Zuckert, M. Zuckert,《施特劳斯拉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② 参见下面第七章。

③ 除上面注释①中所引述的著者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如Jeffrey Barash、Mark Blitz、Michael Gillespie、Robert Pippin、Stanley Rosen以及Gregory Bruce Smith。Stanley Rosen是为数不多的论述施特劳斯拉斯关于哲学可能性之关切的著者中的一个。参《维特根斯坦、施特劳斯拉斯以及哲学的可能性》(*Wittgenstein, Straus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y*), 见*The Elusiveness of the Ordinary: Studies in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白他的思想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相关时,他的读者才会充分理解他的著作以及海德格尔的著作。

这一断言让很多人感觉不可信。施特劳斯的作品好像对形而上学问题不是很关心,而海德格尔的思想也缺乏对政治问题的密切关注——虽然臭名昭著地卷入过某种政治漩涡。该困惑的部分原因在于,施特劳斯的作品经常被他的学生(第一代和第二代学生)所阅读,但是他的学生大多数都不愿从事对形而上学文本和思想家的研究,[3]尤其是更不愿研究那些晚期现代性思想家。就“第一哲学”之前而言,施特劳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推崇一种特定保留(虽然既庄严又令人敬畏),通过他的克制,哲学开始于对事物“表面”及政治和道德现象的人类经验的反思(*TM*,13)。然而,对于施特劳斯来说,事物的表面只是问题的发源地,但不是绝对原则和问题解答的发源地。事物表面在其模糊性中指向了对自身的超越。他断言:“内在于事物表面的问题,且仅存在于事物表面的问题,是事物的核心”,这一论断是他对苏格拉底哲学追求的总结。但是,该论断也和现象学“面向事物本身”的转向明确关联,该转向始于胡塞尔并由海德格尔所继承,它的内容包括对给定的理论结构加以悬置,并对存在于理论探究以及实践生活中的传统观念之“沉积”进行拆解。换句话说,现象学的大纲就是要从前科学的理解中阐明科学的来源(*SPPP*,34-37;*WIPP*,74-77;*RCPR*,28-29)。^①

古典政治哲学——由苏格拉底所奠基——无需拆解先天传统就能够在不依赖于历史研究的情况下,探究关于政治现象的前哲学理解。^②施特劳斯强调,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现代学者需要这样一

① “既然自然理解乃是科学理解的前提,那么,对于科学或科学世界的分析就要以对于自然理解、自然世界或常识世界的分析为前提。”见 *NRH*,页79。同样可参见下面第三、四章。

② 参见下面第二、三章。